

理性與信仰寬容

劉 楚 華

(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, 香港 九龍塘)

提要:本文論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恕道思想,中古以後由於文化融和而產生的信仰寬容,總結了中國人在處理文化差異與宗教矛盾方面的歷史經驗,並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對待信仰的態度作了反思。

關鍵詞:信仰 理性 寬容 恕道 文化融合

一、緒言：以人倫為核心價值的民族文化

世界各大民族,按照他們的思維性格,建構自己的社會組織模式,設定生活的倫理規範,這是文化中理性的一面;他們又將認識中的宇宙組成、自然規律、世界圖象投射到非理性想像和超越感情領域,形成他們的宗教信仰。不同社會面對困難的時候,使用自己方法去調解矛盾。因此之故,一個民族的倫理性格和宗教取向,二者之間的互動,又會在歷史的長河上形成不同的歷史結果。

我們的世界地圖,若按宗教類型分別,共有三個大文化系統。其一,西方的基督教、伊斯蘭教、猶太教,同屬先知型,信仰絕對一神,三教關係親緣密切,他們之間恩怨糾纏的歷史,誰也理不清。其二,印度教,屬神秘型自然宗教,崇拜多神;印度佛教發源自婆羅門傳統,主張自覺離欲、自求解脫,重視冥想和思維修練。其三,中國宗教,智慧型,道教信仰神仙,追求長生,重視自力修行;儒家思想以人倫價值為核心,重理性內省,珍惜人際關係,主張克己恕人,面對自然則強調天人和諧,人本色彩濃重。在三大系統之中,中國人在宗教神秘方面,表現最為淡薄。儒家到底是否屬於宗教,至今仍有相當熱烈的爭論^[1]。然而,正由於沒有強烈的宗教立場,儒家纔可能具有回應宗教、緩和信仰衝突的思維,尤其與一神信仰的傳統相對比,儒家思想又別具調節矛盾的能力和對異教信仰的寬容精神。

自先秦起,思想界已普遍瀰漫“天道遠,人道邇”的觀念,長遠地為中國社會奠定了人本精神根基。入漢以後,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價值的社會模式已經穩固。穩定的社會局面,至漢末出現巨變,這時中國經歷第一次大規模的外來文化衝擊,儒家開始面對本土道教和印度佛教的雙重挑戰。經過魏晉六朝長達三百年的對話,儒釋道三教各有調適,終達致“世出世不二”的理論,現實上做到了以儒家為軸心的三教共存局面,此段時期民族、宗教與文化來了一

[1] 任繼愈編《儒教問題爭論集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年版。

次大融和，是開創隋唐統一盛世的重要條件。儒家社會，一方面被目為過於世俗而缺乏宗教心，另一方面，又容許俗世倫理與出世倫理長期相依並存，也因此之故，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宗教流血衝突，不曾因為民族間信仰紛爭而引起戰爭，這是世界歷史上很特殊的現象。

明末中國少與西方文化接觸，錯過了相互理解的機遇。直至十九世紀，西方宗教隨附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，一向行之有效的儒家式寬容，突然面臨堅船利炮的脅迫，顯得無力應對。二十世紀，社會劇變與儒家文化崩潰，東西文化衝突下，宗教領域上的矛盾，一直膠著難解。自八十年代以後，中國因經濟開放而積極面向世界，二十一世紀隨著航天技術發展、奧運成功申辦、市場經濟快速發展，在中華民族經濟自信逐步高漲的同時，傳統文化已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破壞，中國社會卻漠視精神文明的建設和文化修復的工作，尤其是對倫理與宗教領域的關注，比起任何其他方面，都顯得不成比例地薄弱。因為文化發展失衡，衍生大量社會問題，宗教信仰是其中一個難題。

環顧世界，正當全球正在號召文化多元、民族融和，準備迎接和平新紀元的時候，舊疾癥結未治，中東地區民族文化差異、宗教矛盾與複雜的政治經濟利害糾纏，戰爭的災難無日無之。此種情況之下，中國如果要在全世界和平上承當更重要的角色，必先具備跨文化視野及對世界文化的正確認知。今日中國人，最迫切的需要，可能是用平常心，借鏡傳統智慧與歷史經驗，儘快修復民族文化的自信心，然後以開放的胸襟，尊重不同文化的信仰傳統，肯定有助建立國際友誼，促進世界和平。什麼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睿智？我們有什麼可參照的歷史經驗？該從古代信仰文化說起。中華民族的歷史，可說是一部多元民族之間不斷融和、持續擴大更新的經驗史。古代有幾個重要的文化融合階段，第一階段在上古至先秦。中國幅員廣闊，本由多民族組成，血統觀念不强，諸夏與其他部族共處，經過長期相互影響，融為一寬大開通的民族。殷商時代宗教性强，各部族崇奉自己的神靈，到後來出現了“上帝”的觀念，於是不同民族，共奉一個諸神之神的上帝，此時社會已透過共同的信仰，完成了一次民族文化的大融和。西周革命，以“天命”為政權轉移的理論依據，故周代禮制中，諸侯卿大夫只可以各自祭本宗的祖祠，天子則奉行郊祀，象徵只有天子至尊，纔能代表天下向上天祈福，確保天人的洽諧關係。不同於殷商的鬼神崇拜，西周禮樂文明的進步性，在於將宗教理性化、禮儀化，自此以後，祭禮的政治社會作用，已超越了原有的宗教涵義。西周開始，神道觀念被政治所吸納，而人道觀念則重視個體與群體的共同利益，遠離宗教神秘、重視政治現實。其後的儒家即繼承這種理性傾向，以人道為本的精神，奠定中國文化的大格局〔2〕。

二、儒家理性

春秋戰國亂世，百家爭鳴，諸子各有所見，大都為解救時弊，社會現實性較強。唯有孔子首先全面思考文化問題，見周禮崩壞，呼籲重建秩序，並提出他的人生思想。孔子的出現，進一步確定中華文化之人本中心性格，把民族的歷史，導向理性和平發展的一面。

孔子說“敬鬼神而遠之”。何以“遠”鬼神？因為孔子整套思想定位於現實人生，在人道與神道之間，他選擇了人。孔子對於富爭議的宗教，不輕易議論，對於現實人生問題，尤其社

〔2〕 錢穆《中國文化史導論》，臺北正中書局，1950年版。

會政治的實務，無論如何複雜，可以尋求具體解決。而且人道考慮必先於神明。儒家的理想，在於現世人生求安身立命，故積極彰顯人性，建設美好生活，不在於追求超世價值。孔子雖重道德理性，言不談神秘，這並不妨礙他的宗教情懷。首先，孔子遵周禮，禮祭的傳統來自文化積累，“敬鬼神”表示對歷史文化的尊重。雖然其弟子說，夫子的“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”，實際上孔子默識天道、“畏天命”，對於天有特殊的體驗。他在祭祀之中保持深厚的宗教感情，心存誠敬，祭神如神在。與其說儒家缺乏宗教精神，不若說其對待宗教理性而開明。不論東西文化，即使濃厚宗教背景的傳統中，都珍惜人性與人生的價值。儒家的倫理觀念，既平實淺顯，又屬於普世的關懷，足以成為會通神道與人道的理論橋梁，儒家對待宗教的理性寬容態度，也可以為其他文化提供思考的參照。

孔子的學問離不開現實人生，他思考的課題，不外乎人的生存狀態如何？人生追求什麼價值？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人如何可以好好地存活？孔子尤其善於以生活經驗為基礎，使用平實親切的語言去概括真理。不論從人生哪一個層面去考察，都以人為本，謂“仁者，人也”“仁者，愛人”。孔子認為“仁”是人性本有的品質，謂“為仁由己”，求仁得仁，進一步，將先秦通義中的“仁”，提升為足以涵蓋其他德目的最高道德理念^{〔3〕}。

孔子又為忠和恕二字創造了新的意義。經孔子提倡之後，“恕”被涵罩在“仁”義之下，與“忠”並列，互為表裏，成了儒家特別推重的道德品質^{〔4〕}。曾子深契夫子之道，亦將孔子思想系統總結為“忠恕”二字^{〔5〕}。在孔子來說，忠恕與“仁”同義，是人性中尊貴品質的兩種不同表現。仁愛的具體表現和實踐途徑，可分別表述為對己與對人兩個向度。對己則忠：尊重自我主體、堅守價值原則，盡己之心去行仁，完善自己的人格。對人則恕：在人我的關係之中，行事要將己之心比度人之心，推己及人，設身處地，不以我之所不欲，強加於他人。作為仁道的一體二面，“忠”是自我價值的意識，先自我肯定，先認同了“仁”，再由內心外發成行為，自然待己待人均合於道，這就是有德者的表現。孔子透過“忠”體現“仁者”主體生命的精神境界，又提出“恕”作為人最低限度應守的社會行為規範。仁的表現，由忠到恕，內外一貫，具體而明。

三、恕道與寬容

先秦以後，恕道成為儒家思想重要標誌，經後世反覆討論，歷代儒門的補充，理論臻至完善。恕道的涵義及其與仁道的內在關係，大概可分述如下：

〔3〕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已”；又《顏淵》“為仁由己，而由乎人哉”。見朱熹《四書集注》。

〔4〕先秦典籍之中，“忠”的品質很受重視，出現次數遠較“恕”字為多。忠為《周禮》“六德”之一，本義是忠實，言出於心為忠；引伸到人事，最常見的通義指君臣關係，臣事君竭誠無私、忠心不二之謂。孔子教弟子以忠，特別給予道德自覺意義，將忠理解為忠於自己人性的本質，重視由個人修養做起，言行表裏一致、忠於自我的表現。“恕”字在先秦原不是常見的德目，諸子之中墨子兼愛刻苦、宋鉞“見侮不辱”“不苛察”於人，不同程度地主張和平主義，提倡有人容物的修養；老子亦主退己謙和、寬容於物，與儒家恕義近，而都不用“恕”字（見《莊子·天下篇》）。獨孔子標示“恕”，將之提高到理論綱領的地位。“恕”本義“如心”，《中庸》疏云：“付也，付度其義於人也。”

〔5〕《論語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唯。子曰：門人問曰，何謂也。曾子曰：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”見朱熹《四書集注》。

1. 恕道推己及人，由近及遠。

子貢問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”

子曰：“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。（衛靈公）

恕之取義，淺近平實。人身處世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真切易見、具體可行。而恕行推而極至，是聖人仁愛無私的偉大襟懷。待人接物，應對諸般，一日為人，一日行仁，終身奉行不捨，是無窮的道德實踐過程。

此種由近而遠的次第，與孔子一生下學而上達的心路歷程可謂一致。孔子年七十仍然行不逾矩、終日不違仁，可以想象假設七十以後的孔子，有一事不能恕己待人，必亦憂心終日〔6〕。恕道切近而致遠，它既是待人接物最低限度的行為規範，若能不斷實踐，就是最高至善的道德情操。

2. 恕是人際關係的自我反思

子曰：“仁豈遠乎哉，吾欲仁，斯仁至矣”“為仁由己，而由乎人哉”。孔子終其一生不斷在道德上自我反省。道德的反省是自責自足的，“恕”亦純屬自我要求，盡其在己，先是自我覺識，繼而推及他人；以己之心量測他人之心；在比度他心之先，必經以上反思過程，自問：設身處地，我心若何？用程伊川的話，就是自問是否“以愛己之心愛人”。

恕道的實踐，積極地說是：“仁者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”消極說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。兩方面都由自身做起〔7〕。總言之，儒家重人道，恕道是在人際交往中不斷自省，人人律己恕人，人間和諧的關係自然建立。

3. 忠恕由仁，一本萬殊。

上文說過，忠恕與仁道緊密關連。忠恕之道實踐上可能存在困難，或問在忠誠盡己與寬恕待人之間，可能出現矛盾嗎？首先，不同思想系統，真理標準不一，不同道上的行人，各以所行為至道，各自稱盡己之忠誠。然而，對於思想異己者的寬容，是否意味妥協或者自我背離？若從儒家觀點說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因為恕由忠出，二者依據同一真理。仁者盡己立己，他所真誠不妄地奉行的價值，和他推及於人的道理，不應有矛盾。儒家的恕道不是無原則的寬容，而且以仁道為歸依、以禮義為軌則。換言之，對己待人，亦忠亦恕，都由“仁”道統率。

宋明儒理解的忠恕，是人對待“理”與“事”的態度，可以用“一本萬殊”說明二者關係。忠恕同本於道，在己盡心竭誠不失於道叫做忠。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，推己及人叫恕，忠和恕在道理上是一致的，只因實際生活中人事有各種具體差別，致使在實踐恕道時“施用無窮”而已〔8〕。

如此說來，儒家提倡的恕道，不表示變改原則，反之，面對思想異己者，應當在堅持真理原則之下寬厚對待。孟子對於不同意見者，一方面嚴守正道、排拒邪異、據理爭辯，另一方面

〔6〕 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。孟子也說“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

〔7〕 朱子《大學章句》：“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，所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〔8〕 《論語章句集注·里仁》。程子曰：“以己及物仁也，推己及物恕也，違道不遠是也。忠恕一以貫之，忠者天道，恕者人道；忠者無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，忠者體，恕者用，大本達道也，此與違道不遠異者，動以天爾。”朱熹進一步解釋：“蓋至誠無息者，道之體也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，萬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。”見朱熹《四書集注》。

又採取懷柔寬恕的態度，“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茆，又從而招之”。可見忠恕在真理面前是一貫的，一時間未能排解的矛盾，儒家會以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風度處之，對於不合道義之事却不能苟同。對真理不同看法可以理性辯解，現實糾紛則可以折中處理。無論如何，以寬恕待異己，確保人間可貴的和諧關係，這個原則不能改變。

“忠”顯示儒家竭誠守道、莊敬自強的道德理性，“恕”道則透露儒家重視現實層面，對事開放、適變，對人寬厚同情，表現溫和感性的一面。中國人在忠恕課題上的不斷思考，說明他們一直為追求美好生活而努力，而儒家為本位的中華文化傳統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，又把中國人塑造成尊禮尚德、仁慈寬厚、愛好和平的民族。

四、中古的歷練：信仰寬容與文化融和

人類族群之間相處，往往是由於文化習慣不同而引起的衝突。由於大家對於所崇信對象或真理的理解有差異，而直接衍生矛盾。有宗教信仰與沒有宗教的傳統之間，因認同的真理標準、或者詮釋方法的有別，亦會引起族群之間的誤解。今日中國在世界的影響與日俱增，儒家的傳統智慧能否適用於新世紀的國際交往？持恕道原則與宗教倫理進行對話是否可行？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。儒家考慮問題莫不從普遍人性出發，以“忠”堅守至道和以“恕”為處世規範。從這個基本定義看來，“忠恕”並不是儒家思想獨有的命題，而是具普世性的倫理原則。人與人的交往，無論在什麼傳統、處於什麼情況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乃必須遵行的守則，只有在這個基點上，不同意見者纔有相互溝通的可能。同理，溝通不同宗教思想、解決民族紛爭，都離不開這個守則。世界上不同民族語言都有與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同義的格言，只是不像儒家那麼強調而已。它是不同文化都能認同的準則，不同宗教和諧共存所必守的“金規律”^[9]。儒家文化的獨到處，在於歷代儒士對同一問題反覆探討，又把忠恕道理持續廣泛地實施於教化，因而塑造了崇尚忠恕的中華民族性格。

歷史說明，忠恕倫理締造了社會的和諧，令中國發展長期穩定。即使在社會動亂、文化衰落的時代，儒家仍能以其充分的自信，包容不同學派理念和接受外來宗教文化的挑戰。透過理性的會通，消融差異，將中國文化創造成廣納百川的恢宏局面。漢魏六朝的文化融和可說是一段寶貴的歷史經驗。四百年間印度文化傳入、儒家與佛道二教交鋒，由尖銳衝突到義理融會，中土文化借此廣納了新的元素，下開隋唐盛世。

魏晉六朝，亂世多難，人命缺乏保障，社會普遍對宗教救度有熱切需求，人們渴望精神慰藉，因而佛教大興，本土道教亦急速發展。社會由於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，保持倫理綱常的觀念，孝義為先的價值沒有動搖，故社會仍如常運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整個六朝宗教熱情高漲，文化多元並存，信仰選擇極為自由。雖然儒釋道三家競爭激烈，而社會生活中不同宗教信眾基本和平共處。讀南北史人物傳記可知，士人信仰多受家族影響，但個人可以自由改換信仰，儒生信佛修道者眾多，有些人一生幾次改變信仰，甚至雙重或者多重教籍的情況十

[9] 金規律 Golden Rule。猶太教：“你若不願別人這樣對待你，那你也不要這樣對待別人。”（拉比·希勒《安息日·31a》）基督教：“所以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（馬太福音 7.12）

分普遍。其中神仙道教屬於本土宗教，倫理觀念與儒家相同。中印民族性格與信仰觀念歧異較大，佛教所以能在中土生根，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可能由於佛教沒有強烈的排他性，慈悲戒殺、衆生平等主張，與本土儒道仁愛的觀念可以相通，故儒士與佛子能融洽相處。另一方面，也說明中華民族對其他文化的開放包容，儒家雖以俗世倫理為主，却尊重信徒的出世追求，這種宗教的寬容，與中國社會長期重視忠恕的儒家教育有莫大關係。

文化的融合並不能一蹴即至，必經漫長的理性對話與不斷調整妥協的過程。以下試分三個層次，以儒釋由摩擦衝突終至達到和平共處為例，重溫一下中國人在處理文化差異與宗教矛盾方面的歷史經驗。

1、生活文化的融合。

東漢佛教初傳，先以治病祛災、神怪異相的形式流行於民間，中土儒士對於佛教出家修行批評最烈，以為胡僧削髮袒肩，有違禮儀，佛子出家，無視孝道，直接衝擊倫理綱常^[10]。晉沙門慧遠大談僧家離俗，身分超然，不涉政治，撰《沙門不拜王者論》，備受當時輿論關注。此類中印生活文化風尚、俗世出世價值方面的辯論，由漢末持續至齊梁不曾停止。晉宋之間，佛教徒為爭取社會認同，非理性表現頗為激烈，有不少僧尼燃指燒身一為信仰犧牲的事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行為非由宗教迫害所致，多由佛徒自發，後來反而由統治者立法加以限制^[11]。

至齊梁以後，佛教地位穩固，加以受本土文化薰染，信仰行為趨向理性化，行為表現亦變得克制平和。中土人士與佛徒長期相處後，逐漸尊重離俗出家的個人選擇，社會已廣泛接納僧徒兀髮的身體標誌。佛教亦為了適應中土文化而調節習慣，日漸漢化，後來中土僧人的習俗，就出家不棄親，離俗不離世。佛子由不拜父母王者，變為孝親而且依附政權，此中轉變不可謂不大。齊梁以後，整個社會不同信仰者都和平相處，中土完成一次大規模的多元文化融和，為隋唐一統盛世創造了合適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條件。

2、宗教管理政策

南北朝期間，三教為爭取政治地位之先後而持續競爭，唯極少出現流血的宗教戰爭。中國佛教史上滅佛事件僅三次，都由統治者發動。其中二次發生在北朝，北魏太武與周武帝毀法，兩次都出於政治或社會經濟的理由，其滅法期短，復興亦速。歷史上，中國民間信眾之間，因宗教歧異而引起鬭爭殘殺的情況，十分罕見。

中外文化衝突下，如何調解民族矛盾、平衡三教利益，統治者的對策有主導作用。六朝不論南北，都有宗教的管理政策，由東漢早期的簡單控制，到東晉南北都創設僧官，實行以僧管僧，至後來迅速發展，從經濟支援、組織管理、思想文化各方面考慮，制定長遠的宗教管理政策。北方宗教精神濃厚，常牽涉複雜的民族糾紛，政策較具體而周密。南朝則偏向文化和理論整理，立法溫和適中，甚至能用扶助宗教的手段來穩定政治，對於反抗者大致寬容，即使或有鎮壓制裁，亦不致嚴重傷害。六朝宗教政策不斷改善，至齊梁逐步完備，並且為後世所

[10] 牟子《理惑論》，見梁僧祐《弘明集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2冊，第2102號。

[11] 見梁慧皎《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；《比丘尼傳》《大正藏》第50冊。

參考繼承^[12]

3、理論融和

中國宗教鬭爭的特色在純屬筆舌之戰，這類宗教理論的競爭，當以南朝為代表。三教義理的爭辯，由東漢末開始不曾間斷，至梁武帝進入高潮。在整個局面不穩定的南朝，仍具見文明社會的理性精神^[13]。

六朝宗教論爭有幾個較重要命題。早期爭論最烈的仍是“孝道”問題。印度本無孝道觀念，佛教剃髮出家不合中土孝義，故佛教譯經初期，已意識到倫理文化之差異，為適應本土重孝傳統，積極打造父母報恩故事，將出家解釋為大孝行為，辯稱出家能報過去世父母恩，故此，佛教奉行出世孝，儒教所行世間孝，其行雖異，其理不違。經過幾個世紀的磨合，儒佛在孝道上達至調和，而且是由社會生活到思想理論上全面的融合。

“神不滅論”是另一個辯論焦點，經學家多不信鬼神，他們持“神滅論”批判宗教。例如宋范曄是無神論者，曾撰《無鬼論》，終生不信因果輪迴。他對西域文化作了以下評論：

詳其清心釋累之訓，空有兼遣之宗，道書之流也。且好仁惡殺，蠲敝崇善，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。然好大不經，奇譎無已，雖鄒衍談天之辯，莊周蝸角之論，尚未足以概其萬一。又精靈起滅，因報相尋，若曉而昧者，故通人多惑焉。蓋導俗無方，適物異會，取諸同歸，措夫疑說，則大道通矣。贊曰：邊矣西胡，天之外區。土物琛麗，人性淫虛，不率華禮，莫有典書。若微神道，何恤何拘。^[14]

另一方面，魏晉以來，士人對印度文化又充滿好奇，即使非佛教徒，也好讀佛典，欣賞佛經哲理，只是多不能接受其中誇誕神秘的宗教傾向。類似范曄此類評論，有肯定也有批判，相當理性客觀，基本符合現實，他對印度文化的觀察，是當時宗教和文化評論中典型的儒士風格。

佛教盛行幾個世紀後，中國人已完全尊重佛教精神，視宗教信仰為個人選擇，謂削髮出家與入世謀仕，同為嘉行，只是忠孝難全，個人就要在報恩報國之間有所取捨。北齊奉佛儒士顏之推，認為出世與入世的人生價值是完全同等的，他說：

內教多途，出家自是其一法爾，若能誠孝在心，仁惠為本，須達、流水，不必剃落鬚髮……求道者身計也，惜費者國謀也，身計國謀，不可兩遂，誠臣徇主而棄親，孝子安家而忘國，各有行也。”^[15]

至於南方，自東晉以下，維摩崇拜早已屬文人風尚，因此，出世入世之間不是絕然對立的抉擇，對於通達的文人，早已不是問題了。中印文化經過長期努力，儒佛在理論和實踐上反覆調節，纔得此互諒互重、兩相適應的結果。此中儒家理性傳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，中華民族的恕道與信仰寬容，實為此時期中印文化、儒釋道三教之間理性對話的重要基礎。

[12] 李剛《魏晉南北朝宗教政策研究》，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版。

[13] 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版，下冊第14章第357頁：“南朝佛道之爭，純用筆舌，以義理較長短，北朝則於其始即用威力，作宗教之鬭爭。”

[14] 《後漢書》卷八十八《西域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版。

[15] 王利器《顏氏家訓集解·歸心十六》，中華書局，1996年版。

五、當代文化的曲折與迷思

中國南北朝以極衰之勢，與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接觸，吸收了印度的宗教精神文明。第二次是以唐代以極盛之勢，接納了大食波斯阿拉伯的物質文化，兩次都能從容應接。第三次在晚明及清初，歐洲基督教東來，接觸短暫，由於中國政治與學術都在不正常狀態，錯失東西深入對話的機會。直至十九世紀，中國社會不安，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突飛猛進，歐洲文化乘著帝國主義在東西不對等的情勢之下來華，中國完全缺乏接應條件，選擇片面仿模西方物質科技，却無心細究其精神文化根源，導致清末西化失敗。鴉片戰爭前後，基督教雖已在中國傳播，而中西實並未達致真正對等的文化交流。

二十世紀五四運動全盤西化，學倣西方民主和科學。在反封建反迷信口號下，新文化運動將傳統中一切負面價值歸罪儒家，自鼓吹打倒孔家店以來，傳統文化大本已傷，這時的中国面對西方文化，已不可能像六朝隋唐時期般從容自信。新中國奉西方唯物為指導思維，至今雖超過半世紀，中國人離真正認識西方文化底蘊的路途尚遠，難借此為中國社會根植正面的精神價值。近代中國人囫圇吞棗地吸收西方思想，原意為抵抗西方的帝國殖民侵略，却因此付了沉重的代價，經歷多次文化自我否定、背棄恕道的意識形態武裝及階級鬭爭，傳統文化的根基徹底破壞。若謂近代中國社會是文化歷史上空前的價值思維紊亂、忠恕倫理失陷、精神文化真空的階段，並不為過。

宗教固然與整個傳統文化的際遇一樣，同受災難，更使人憂者在人道無存。如上文所說，中國文化性格本來最重視倫理理性，則近一百年中國文化歷史的歧路，標記了文化自我的失落，一向仁厚的民族性格備受扭曲，仇恨恐怖淹没人性，缺乏理性自省的恕人精神。當代國人或礙於歷史觀、或囿於慣性的思維方式，不能寬待思想異己者。當代文化疾痼在缺乏理解精神現象的文化深度，因而在處理與宗教現象糾纏的社會難題的時候，每顯得智力單薄，到了極端的情況，就致於棄理性而用暴力。一個民族對宗教有多少寬容，幾乎是測量這個民族思想開明程度的指標。隨著改革開放，九十年代國家所定的宗教政策，比過去進步，基本方針是將宗教定位為政治社會問題處理^[16]。然而信仰是精神現象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，單用政治手段不能全面解決宗教文化的問題，更應從文化角度考量，致力修復民族文化及建設精神文明，根本地恢復傳統儒家忠恕文化的教育。或者說，由文化的自我再認知做起，修整民族心理、重拾文化的自信。只要有民族文化自信，纔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，纔有條件與其他文化體系平等對話。

一百年來，中國人自己將儒家思想標籤為封建文化象徵，即使近年學界的儒家研究，方法上經常固守慣性。以下是“恕道”的典型詮解方式：“恕道，作為封建社會所推崇的道德，一味強調將心比心，其認識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，只從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出發，客觀上達到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……”

上文說過，孔子的思想是從普世人性思考出發，不能脫離人生體驗和切身反省，人文關注與普遍真理是跨越民族文化的，如果讀論語而不用平常心去體會，只套用固定的二元對反

[16]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編《宗教政策學習綱要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，1995年版。

思維，或先把儒家定性為封建文化渣滓，後進行舉證，這種研究方法，恐怕永遠不能正確理解儒家的真義，遑論將其中精神推及於教育建設。

中國如果要建設精神文明，就不能避免重新認識儒家文化的問題，至低限度，有必要檢視過去五十年的研究方法，尊重文獻原義、虛心讀歷史、積極反省當代文化。除了參考古代歷史經驗，還可以參照現實經驗和理性的意見。由於亞洲地區國家的快速發展，近數十年社會經濟學者常引用韋伯的理論，認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經濟組織形態，與其深厚的文化基礎及其倫理性格有莫大關係。這些地區，包括亞洲華人及日韓民族，生活勤儉、愛家族、重教育的品質，都來自儒家傳統^[17]。環顧漢文化圈的毗鄰，及近百年來東南亞華人族群，他們的生活方式，比起中國人更能保守傳統倫理價值，他們愛好和平，寬厚信實，既與所住地民族相安共處，又保留自己風俗文化，表現靈活適應力與獨立的文化性格。最特別在華人與不同族群之間，關係洽諧，因為信仰而衝突的情況並不多見。

海外學人一直關心中國文化的命運，1949年後遷流海外的一批華人及儒家學者，整理儒家哲理、推動教育、捍護傳統文化。1958年新儒家學者有見於當時西方學者惑於中國政局的劇變，對中國文化多有誤解，乃聯合發佈《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》，主要指出當時西方人士熱衷於中國研究，各抱不同動機，但一般都未能把握中國文化倫理價值的本質，以為古老中國文明已死。新儒家認為，中國文化中堅守仁義的道德信仰，與其他宗教形態雖有不同，而其精神是一致的；他們深信中國文化雖病而未死，堅決以極大敬意去對這活著的文化加以研究和保存。五十年後的今天，這份宣言的精神，對於修復儒家傳統、正面建設中國文化的工作，仍有其深刻的意義^[18]。

如果關注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，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關係，更不得不重新學習儒家。近三百年世界以歐美文化為主流，二十世紀西方以強勢主導全球，二十一世紀了，全世界不同文化民族仍須應付西方強勢影響，中國人將無可避免要與西方、與全世界不同文化持續對話。上世紀東西方宗教界與倫理學界，曾經作過一些努力，嘗試為不同宗教信仰文化，鋪設平等對話的橋梁。例如瑞士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，致力尋求全球宗教倫理對話的可能，大力呼籲推行“世界宗教”：在包容其他宗教差別性中，尋求統一的價值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與人性的尊嚴，這是普世認同的價值。他認為不同文化系統、宗教倫理或俗世倫理的交流，都應以“己所不欲、勿施於人”為共守的金規律，以自我反省批評為對話前提，只有這樣可以締造世界和平^[19]。民間亦有同樣訴求，有組織呼籲不同宗教信仰、不同文化族羣互相諒解，所謂人同此心，這正是合於理性、發乎儒家恕道的願望^[20]。儒家的人文價值觀、其理性寬容的性格及其協調矛盾的經驗，是國人應珍惜的傳統資源，將它應用到多元文化的對話中，為世界和

[17] 馬克斯·韋伯(Max Weber)《宗教與世界》，《韋伯選集》二，康樂、簡惠美譯，《新橋譯叢》，臺北遠流出版社，1990年版。

[18] 1958年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張君勱、徐復觀《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》，見唐君毅《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》下，臺北學生書局，1975年版。

[19] 孔漢思(Hans Kung)著，秦家懿譯《中國宗教與基督教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9年版。孔漢思《世界倫理構想》，三聯書店，2002年版。

[20] 例如1960年美國民間成立的世界宗教殿堂，以包容多元宗教、多元精神價值，促進相互諒解為其宗旨。見Temple of Understanding 網頁，<http://www.templeofunderstanding.org>

平發揮更好的作用^[21]。

五、結語

上世紀二次大戰結束，人類渴望和平之際，全球發展快速趨向一體化、多元化，帶出了各種文化衝突，其間錯綜複雜之程度，亦前所未見。新世紀初，“恐怖”與“反恐”戰爭震撼全球，人們更覺察到文化差異、尤其是由宗教信仰差異所造成的矛盾，仇恨不解，世代積壓，災難自生。不同文化之間，以和平對話尋求諒解的需要，顯得比任何時代都要迫切。所有文化傳統的經典，都說明人類一直追求和平、盼望美好生活。可是理想總是遠離現實，歷史事實也證明，人類經常背離他的理性，不斷重複錯誤，製造悲劇。思想界的悲觀論者懷疑人性是否具備達致互愛互諒的能力。有實證論者以為缺乏經驗事實的理想只是空中樓閣。然而，也有倫理思想家告訴我們，人之所以為人，在於具有克服缺憾、不斷自我完善的理性和道德能力，現實的不完善與人追求善的本質兩者並不矛盾。孔子教人忠恕，而且惟有不斷反省、修德好學、遷善改過，惟有日日自新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、和平幸福的保證。

過去中華民族的忠恕性格，和他所屬社會的和平穩定，實係儒家倫理教化陶鑄之功。如果今日地球村的小空間，不能達致人類近密遠來的情誼，瞬息萬變的信息科技，又無助於彌補人際關係的嫌隙，為什麼不採取人文的思考、學習歷史、自我反省、推己及人？這也許是尋找解救當世民族衝突與文化危機的正確方向。中國人更應記取儒家忠恕之道、博大寬容的理性精神，因為我們的歷史經驗已為全球提供了一面可參照的明鑑。

劉楚華，女，廣東籍，香港出生，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。

[21] 可惜中國社會對儒家傳統文化修復的意識不足，相關的參與亦不夠。聯合國世界倫理對話工作，中國儒家方面的參與，見劉述先《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》，《世界公民叢書》，臺北立緒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